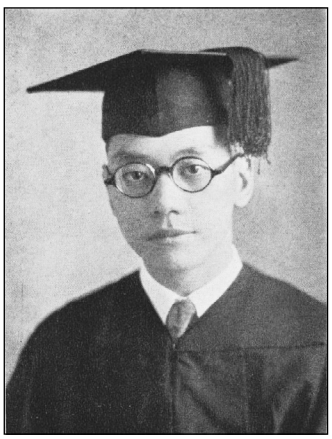
怀念师友

与父母一起生活的短暂时光

○潘亚农



潘白坚学长获学士学位照

（一）

我的父亲潘白坚（又名潘敏，Ming Pan），1900年出生于湖南湘乡，幼年在湘乡和长沙求学。他在1921年考进北平清华学校，1923年毕业时考取公费留美，与孙立人、齐学启、谢婉莹、吴文藻、梁实秋等同学同船赴美留学。先后就读于密西根大学、威廉玛丽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，获威廉玛丽学院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。回国前曾赴英、法、德等国，实地考察市政管理工作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前，他曾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教官和分局长，在湖南省政府任英文秘书，在江西九江任县长。在他任九江县长期间，曾经因为认真禁烟（鸦片）和大力改善九江码头的货运秩序，而使九江成为模范县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冬，父亲收到清华和留美同学孙立人将军来信，邀他去贵州都匀协助训练财政部缉私总队。得知那是一支准备用于抗日的陆军部队，清华和留美同学齐学启将军也在缉私总队任职，父亲迅即低价卖掉在云南安宁县温泉镇自建的住房，前去贵州都匀，在孙将军麾下的缉私总队任职。

1942年春，孙立人将军在贵州都匀训练的陆军部队，改编为新38师，参加中国远征军，开赴缅甸阻击日军。父亲由缉私总队政训处长，改任新38师军法处长。1944年，以中国驻印远征军（Chinese Army In India）为主力的中美联军，光复缅北重镇密支那，屡建奇功的孙立人将军升任新一军军长。父亲也晋升少将，任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和军法处长。不久奉调前往重庆，去军委会外事局交际处任副处长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。

（二）

我在1938年初开始记事儿。那时父母带着我和妹妹（宁宁和胜因）住在云南安宁县温泉镇。那里气候温润，环境宜人，山边洋溢着马尾松的香气，还有著名的碧玉温泉。宁宁和胜因生于1936和1938年，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：她们的名字反映出父母当时对国事的担忧，和对抗战胜利的

期望。

当时温泉镇没有报纸，没有书店，也没有幼儿园。家里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，其中有许多精致的插图，就成了我最初的启蒙教材。父母的耐心解释，更使我终生难忘。可能是因为我在幼年时期，就接触到印刷精美的图书，还有幸听到父母亲细心的讲解，使我后来一直把看书和教学，当作人生的两件乐事。

在父亲外出工作的年月，他好像总是来去匆匆。我多是在早饭前和晚饭后见到他。在他赴印缅抗日、到重庆任职、飞往东北去接收大连时，更是多年或长时间离家在外。我做家庭作业遇到困难时，往往只能去问母亲。只有住在温泉镇那段很短的时间，我和妹妹能天天与父母亲生活在一起，那是我童年时期一段很温馨、很珍贵的回忆。

（三）

父亲在缉私总队任职期间，我进了孙将军在都匀创办的诚正小学。学校与缉私总队机关共用一座大庙。孙、齐两位将军和夫人，就住在大庙南侧一座大祠堂内。父亲的办公地点（政训处）离我们上课的教室也不远。

师范大学毕业的王景佑校长，也是缉私总队的军官。他对教育工作十分热心，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恩师。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，我两手放在裤兜里，懒散地低头徐行。不巧被下班的王校长看见。王校长严肃地告诫我，应从小注意走路的仪态。作为官兵子弟学校的学生，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。应该挺胸、收腹、目视正前方，用端正有力的步伐走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改掉了把手放在裤兜里走路的习惯，也一直注意站姿和步态。

抗战期间贵州生活比较艰苦。小学课本用的都是未经漂白的纸张。练习本则用当地出产的毛边纸。但学校老师（大多为军官的妻子）教学工作热情很高。我记得有位老师说过：人类社会大多要经历三个时代——敬畏大自然的神权时代，相信圣贤和帝王的皇权时代，由国民选举官吏的民权时代。后来这位老师又说：日本侵略者自称大日本帝国，还处在皇权时代。我们中华民国比日本帝国进步，所以我们抗战必胜。这样一些精辟生动、简洁明快、带有战斗动员色彩的讲述，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那位老师也是缉私总队的眷属，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讲述，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新意。1940—1942年间，父亲也多次到学校来讲过抗战形势和欧亚动态等内容。

诚正小学对学生的教育，也体现了孙立人将军一贯坚持的教育理念——礼、健、智、诚。礼是指言行守规矩、能够敬业乐群，要求学生忠于国家、尊敬长辈。健是重视对学生进行体育训练，使学生具有强健的体格。诚正小学的体育课上得很认真。老师经常带我们爬山和远足，使我们的学校生活生动活泼，同时也陶冶了我们的性情，开拓了我们的视野。智是鼓励学生爱惜光阴，勤奋求学，增长为社会和国家效力的才智和本领。诚是指不弄虚作假，例如考试时不偷看、不抄袭。诚实本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，也是孙将军特别看重的优秀品质。因为孙将军坚信：离开了诚实，个人会成为害群之马，社会也将

潘白坚学长

永无宁日，人类也不能和谐共处。

诚正小学与缉私总队部分官兵共用一个操场。士兵们每天在那里列队出操、练单双杠、跳木马、练刺杀。教官们尖利的口令声此起彼伏，士兵们则个个汗流满面。孙将军与齐将军也常来察看士兵操练，有时还做示范动作或简短训话。士兵们威武雄壮的英姿，整齐有力的步伐，既使旁观的小学生们惊羡不已，又是小学生们最喜欢模仿的动作。所以，立正、稍息、挺胸、收腹、高声报数那一套，我们当时也能做得有模有样。

由于诚正小学不收学费，许多都匀当地的儿童也进了这所官兵子弟学校。虽然大庙门口布置了站岗警戒的哨兵，晚上经过庙门外的仓后街，还必须朗声回答口令，但在白天，当地学童却能无拘无束进出大庙，并在缉私总队的机关大院上学。当时缉私总队下辖6个团，具有一个军的规模。它的机关重地显然并非等闲场所。这种情况，十分生动地反映出孙将军重视教育、热心办学的进步思想，和他关心、爱护、亲近、优待当地学童和民众的爱国情怀。

（四）

我家刚到都匀时，住在都匀天主堂前一条小街上。胜因妹下面的一个小弟弟，因为医疗条件较差，才几个月就病死在那里。贵州都匀冬春阴冷多雨，那年许多人都患感冒，小弟弟的感冒转成了肺炎。我记得小弟病危那两天，我的母亲（萧碧澄）多次抬头仰望东山和天空，似乎希望得到上苍的保佑。父亲下班回家时，浑身烧得滚烫的小弟弟已经停止了呼吸。一个平头圆脸、很惹人喜爱的小生命就这样夭折了。那真是艰苦战争年代的无奈和悲哀！后来，缉私总队军需处长张明信的小女儿，也因缺医少药在都匀病死。

第二年，我家搬进天主堂后面一所平房。它有多间卧室，只是下大雨时漏得厉害。平房位于山坡上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。1940—1942年间，我在家里见过孙伯母、齐伯母、张明信处长和唐守治、程思泉、陈湘南（具体职务记不清了）等多位抗日前辈，也很喜欢听他们与父母谈话。我家在那里住了四年，三妹长生和四妹寄华，都出生在那里。距离平房不远处，还有一所抗战时期的炮兵学校，据说郝柏村先生也曾到那里进修炮兵技术。

在云南安宁温泉镇闲居期间，父亲喜欢埋头看书。来到都匀以后，我发现父亲喜欢游泳。因白天往往有事，他喜欢在下班或晚饭后去剑江游泳。天黑后江水闪着点点星光，稍远处就是一片漆黑。望着他跳下水去消失在黑暗中，我总感到非常害怕。只有听到父亲在江心叫我的名字时，我紧张的情绪才会松弛下来。所幸秋去冬

来，游泳季节结束。后来孙将军所部官兵，改编为新38师，编入中国远征军赴印缅抗日。在那以后，父亲就再没有机会去剑江游泳。

父亲在缉私总队任职期间，生活中多了一项特殊内容——自己补袜底和钉纽扣，那时穿的棉纱袜底很不结实。都匀阴雨天多，弄湿的袜底破得更快。父亲总是把洗过的破袜子套在脚掌形木板上，再用细洋布补好。为使军服上的纽扣牢固些，他就在衣襟里面垫上一小块布，再缝牢松动的扣子。他说军人会一点针线活很有好处——平时有利于军容整洁，战时有利于克服困难。凡是想要士兵会做的事，军官就应该先会做。几年以后他由印缅战场胜利回国时，还给我带回一个美国士兵用的小针线包。与新一军在缅甸缴获的日军18师团的印章相比，与他们缴获的许多日本军旗（上书“武运长久”）相比，这个来自盟军的小针线包真是微不足道，但它至少可以说明：美军也希望士兵们会一点缝补技术。受到战时生活的启示，那个针线包我用了六十多年。由于有了尼龙袜，我不必再补袜底，但我学会了缝补和修改衣裤，使其更加耐穿，也更为合体。

（五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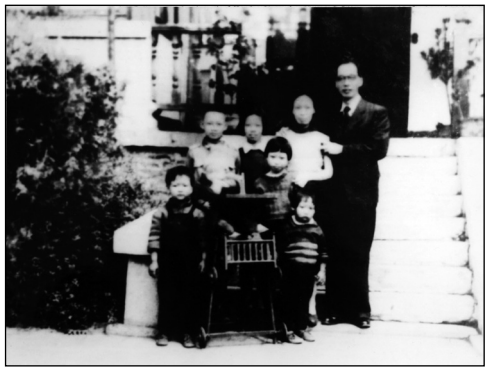
在都匀生活期间，我正处在非常好奇的年龄，父亲也借机给我讲过一些自然知识。有一天母亲讲起灰姑娘Cinderella的故事，父亲却说：其实我们都和灰姑娘差不多，因为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灰尘的海洋中。他说人类和其他生物，其实都不能完全离开灰尘，因为灰尘作为“凝核”，是形成云、雾、雨、雪必不可少的因素。也是因为灰尘对阳光的反射作用，背向阳光的房间里才会有光。如果没有灰尘对阳光的散射作用，人们互相对视时，看到的相貌会十分丑恶——迎光部位非常明亮，背光部位一片漆黑。他还用都匀点的菜油灯做教具，为我演示过日食和月食的成因，以地球自转轴和黄道平面斜交为由，给我解释过四季变化的道理。这些情况使我后来一直觉得，孙将军齐将军和父亲他们那一代人，在清华和国外所受的教育，不仅内容丰富，而且非常扎实。

（六）

1941年12月，日寇偷袭珍珠港得手，同时急派重兵南下，很快侵占了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泰国与缅甸南部，企图切断滇缅公路，进一步孤立中国。甚至企图西进印度，与德寇在西亚会师。1942年春，孙将军在贵州都匀训练的部队，改编为新38师，编入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阻击日军。父亲随远征军赴印缅抗日，母亲带着我和四个妹妹，随新38师留守处继续留驻都匀。

我们再次见到父亲时，已经是三年后的1945年春。那时我家已随新38师留守处移驻贵州省西北部的鸭溪镇，并在那里住了半年。此前，以新38师为主力的中国驻印远征军，已经在缅北战场扭转战局，转守为攻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中美联军已光复缅北重镇密支那，正在向缅甸东南胜利进军，父亲也已由密支那调往重庆工作，他是由重庆回来看望重病的母亲。

或因住处潮湿阴冷，或因鼠类传染疾病，这年春天我的母亲生了一场症状险恶的大病。在那缺医少药的地方，我和几个



1948 年潘白坚学长全家福

妹妹险些成为孤儿。等母亲身体稍微恢复，父亲就在遵义老城区找了一个比较干爽的住处，带我们搭乘遵义酒精厂的卡车搬到那里。那时军委会外事局工作很忙，没过两天父亲又离家返回重庆。

1945年8月中旬，我们终于在遵义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。那几日，遵义城里锣鼓喧天，街上鞭炮声接连不断。邻居见面时互相道喜，人人脸上都喜气洋洋。还在县体育场开大会、演京戏、放烟火热烈庆祝。8月底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们来到重庆，那里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的“陪都”，父亲任职的军委会外事局也在市区。当时重庆街头还有许多庆祝胜利的松树牌楼和彩旗标语，使骄阳照耀下的山城洋溢着抗战胜利后特有的节日气氛。

1945年秋到1946年春，我家住在重庆上清寺聚兴新村，我进了附近的明德小学。明德小学为高小学生开英语课，我们当时用的是《综合英语课本》。聚兴新村与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隔街相望，是政府征用（或租用）的住房。可能因为程潜先生住在新村北面，新村进口处有一个宪兵站岗。当时父亲早出晚归，和同事们在外事局忙于办理移交工作。我看见他们将经过分类的文件，装进不同的牛皮纸袋，然后将写了说明文字的白纸，贴在浅棕色的牛皮纸袋上。

不久国民政府任命父亲为接收委员，命他随沈怡（留德工程博士，有名的水利专家）飞往东北接收大连市。因为苏联红军已经进驻大连，接收工作未果。1946年沈怡出任南京市长，父亲则离开国民政府系统，去河北唐山开滦矿务局，担任开滦煤矿矿警总所所长。

1946年初春，我还在重庆上清寺见到过一次示威游行。游行的学生由西向东，经过上清寺向两路口方向前进。他们喊的主要口号是：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，打倒赤色帝国主义。大约11年以后，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，教师和学生鸣放期间，我才比较明确地知道：是因为苏联红军在我国东北，掠夺机器，奸污妇女，并杀害张莘夫等人，引起重庆和一些城市的学生游行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学生游行。

（七）

因为上清寺聚兴新村希望我家能早日腾房，我家在1946年春，由上清寺聚兴新村搬到重庆红岩村10号。那是陆谦受先生抗战期间自建的住宅。陆是父亲在欧美同学会中的好友，早年留学英国，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副会长。当时陆家已随金城银行复员东迁，所以红岩村10号的住房空了出来。这房建在山坡上，坐南朝北俯视嘉陵江，其空间设计独具匠心，外观也新颖别致。曾有几个学建筑的大学生，请求进来看一下内部结构，他们的好奇心，也使我对住宅建筑发生了兴趣。搬家后我由

明德小学转入红岩小学。它位于红岩村西南，是抗战时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旧址。红岩小学的老师思想左倾，他们的教学言谈中，常有抨击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内容。他们的思想影响，使我后来在1949年冬，就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1949年我就读的宏达中学政治课教师，也称赞我思想进步。若就我当时对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、平等和社会主义真诚朴素的信仰而言，这位老师对我的评语，确实反映了我青年时代虔诚和笃信的思想特点。

1946年12月18日，母亲带领我们由重庆飞往北平。我们坐的民航班机很像军用运输机——只有左右两排背靠舷窗的金属座位。它早上由重庆珊瑚坝机场起飞，中午在武汉机场稍事休息，下午三点抵达北平。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以前，正好由永定门、前门、故宫、景山、鼓楼和钟楼东侧飞过，使我得以由左舷窗口，饱览了古城北平中轴线上的壮丽景色，也使我后来对古典建筑艺术更加着迷。

机舱门一打开，我就看见父亲站在跑道边迎接我们。那天北平气温在零下十多度，父亲却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。我们在北平西交民巷的中国旅行社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就从前门火车站乘车去唐山。那两年我家住在唐山开滦矿区西山路12号，我上过开滦小学和丰滦中学。那是每天都能见到父母、时常聆听双亲教诲，对我来说是十分稀缺和珍贵的和平、温馨的岁月。那时我们常听父亲说起煤矿的重要性。他说发电、炼钢、运输、化工、取暖、做饭都需要煤炭。他说自己过去一直在政府和军队里做事，心中也曾很羡慕那些投身实业救国的清华和留美同学。直到抗战胜利之后，才有机会来煤矿工作，也算是很难得的机遇。在开滦煤矿工作期间，父亲还担任过劳工处长和煤矿主管，直到50年代之初。

1949年秋新中国定都北京时，母亲9月间在唐山开滦煤矿医院生了小妹协光。我和长生妹为在北京上学，先期住到北京旧刑部街37号杨承祚（留美经济学博士，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）教授家里，有幸与同学一起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庆典。父亲则在北京西城区嘉祥里10号买了住房，那是一个房里铺了花砖的小四合院。1949年冬季和1950年新春，我家就是在粉刷一新、张灯结彩的嘉祥里10号欢度的。

1949年12月31日，杨伯母（袁绍英）派长子杨天保来我家，邀请父母亲晚饭后去杨家共度大年夜。母亲因为要给9月生的小妹协光喂奶，父亲就带我去了杨家。杨家客厅里也用彩色蜡光纸、灯具和缎带装饰得喜气洋洋。留声机正放出轻柔明快的乐曲，烘托出温暖的节日气氛。因为中央人民政府用报纸、广播郑重宣告：要以人民政协通过的《共同纲领》为施政方针，全国人民都对国家前途感到十分乐观。对于不久以后将要发生的情况，我们当时没有一点不祥的预感。实业界著名的爱国人士、父母亲生前十分敬佩的卢作孚先生，1952年初在重庆家中自杀身亡，我们听说时也感到非常突然。

若就父母亲在这以后的命运而言，父亲离开沈怡先生去河北唐山工作，恐怕是一个很不幸的选择。1950年4月，他在唐山开滦矿务局住处被捕，1951年4月在唐

山被处死刑。抗日战争期间他用过的佩剑，也被当作反革命罪证在唐山公开展览，还说那是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。我的母亲本来是抗日将领的妻子，也长期背负反革命亲属的侮辱。为了哺育众多年幼的儿女，母亲忍辱负重，含辛茹苦地继续生活了26年，于1976年8月在四川宜宾去世。

往事如烟，往事又并不如烟。许多童年时期经历的事，回想起来仿佛近在眼前！我是多么想念久已远去的亲人啊！

（原载《印缅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》，王伯惠、刘伟华编著，时代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6月）

忆“清华”老爸胡玉和二三事

○胡志康

我有一位“清华”老爸。在上小学时，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爸爸。上个世纪50年代鞍山市在清华大学读过书的人很少，留过洋的清华人就更罕见了。

一个正能量的老爸

老爸一生中的命运拐点都有“清华”的痕迹。爸爸1945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时，考取“租借法案”赴美工厂实习才离开清华大学。赴美期间认识同去的同学顾克铮先生，他是妈妈的表弟。经顾克铮表舅介绍爸爸和妈妈相识，1948年由吴有训教授为证婚人，爸爸和妈妈在上海结婚。上海解放后，鞍钢的曹荫之先生（清华1947级）去上海招聘工程技术人员,爸爸为支援鞍钢接受曹叔叔的聘请。1950年3月带着已有几个月身孕的妈妈来到东北鞍山。由于长途搬迁的劳累，当年4月14日我和妹妹早早（早产）来到人间。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第一年，美机经常空袭鞍山，鞍钢把职工家属疏散到农村。爸爸也把妈妈和我们双胞胎兄妹送到农村，而他回到鞍钢中心实验室，参加鞍钢恢复生产的工作。

胡玉和学长父子参加清华校庆留影

爸爸给我们兄妹起名叫胡志康、胡志敏。取意英文communism的发音谐音康敏。那时他就认定建设新中国要跟共产党走的思想。由于1940年爸爸清华大学毕业后到昆明二十二兵工厂工作时集体加入国民党，所以“文革”中在西南钢铁研究院（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前身）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特嫌”等，还在批斗中将左耳打坏致残。当时与家里断绝